

军情六处

秘密情报局历史

KEITH JEFFERY 基斯·杰弗里 / 著

宗端华 廖国强 等 / 译

MI6



MI6: THE HISTORY
OF THE 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
1909-19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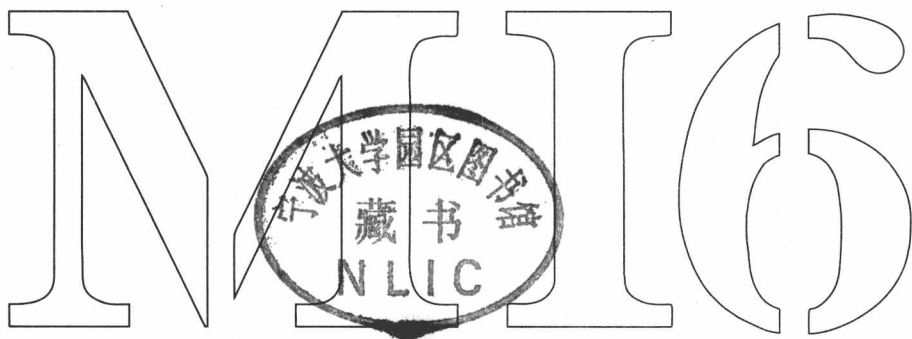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军情六处

秘密情报局历史

KEITH JEFFERY 基斯·杰弗里 / 著
宗端华 廖国强 等 / 译



NLIC 2970701958

**MI6: THE HISTORY
OF THE 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
1909-1949**

CS
HUNAN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军情六处：秘密情报局历史 / (英) 杰弗里 (Jeffery, K.) 著；宗端华，廖国强译。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5

书名原文：MI6: The History of The 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 1909~1949
ISBN 978-7-5404-4934-6

I. ①军… II. ①杰… ②宗… ③廖… III. ①情报机构—史料—英国 IV.
①D756.1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77369号

©Crown Copyright, 2010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M Heath & Co.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著作权合同图字：18-2011-042

军情六处：秘密情报局历史

作 者：【英】基斯·杰弗里 (Keith Jeffery)

译 者：宗端华 廖国强 等

出 版 人：刘清华

监 制：陈新文

责任编辑：易 见 吴 健

媒体推广：赵青梅 谢迪南 刘峰颖

翻译统筹：刘荣跃

版权经理：唐 敏

印务总监：邓华强

内文排版： 吴学军 进 子 赵 靖 刘春瑶 郭 燕 黄 芸

封面设计： ARTVi.com+粉红虫子+韩梁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410014)

<http://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邵阳有限公司印刷

2011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mm 1/16

印张：40

字数：580千字

书号：ISBN 978-7-5404-4934-6

定价：6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前言

基斯·杰弗里的历史著作《军情六处：秘密情报局历史1909—1949》，是情报局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在我的前任约翰·斯卡利特的倡议下，秘密情报局决定在一百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授权出版一部讲述情报局前四十年历史的独立性、权威性著作，目的在于通过讲述我们在残酷历史中的产生和作用来增加公众对我们的了解，这既可尽可能广泛地以飨读者，又不会损害国家安全。允许一位情报局之外的大学教师接触我们的档案资料，这还是第一次。现任英国外交大臣批准了我们的计划。

为什么集中写1909年到1949年呢？首先，秘密情报局的前四十年涵盖了对英国而言至关重要的一段时期；其次，1949年是我们的专业工作转向冷战目标和技术的一个分水岭；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在1949年以后的所有历史详情仍然过于敏感，不宜置于公众视野。杰弗里教授可以随意讲述1949年以前的任何一个完整的故事，可以向公众详细展示情报工作对20世纪的一个关键历史时期所做出的贡献。在此期间，秘密情报局从一个专注于欧洲的小组织发展成为一个可以在冷战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全球性专业情报机构。

为使作者能够准确讲述我们的历史，我们自始至终煞费苦心地向作者公开必要的档案。我们认真履行应尽的义务，以保护我们的特工、工作人员和那些支持我们的人。与来自档案信息资料不同的是，我们对非解密文档的策略仍一如既往。下面对这一策略做简要阐述。

杰弗里教授可以不受限制地查阅涉及这一时期工作的情报局文档。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教授和学者，他做出了自己的独立判断。在这样做的时候，他详细讲述了情报局所面临的种种挑战、成功与失败以及它在头四十年的领导

作用。

最重要的是，杰弗里教授描写了在早期艰难时刻，那些通过艰苦工作、竭诚服务、个性和勇气来帮助建立和发展情报局的男女成员。我看到，这些品质每天都在情报局内不断闪现，我们的工作人员为了保卫联合王国和维护国家利益，仍然在遥远的地方面临着危险。我知道，我的前任们也会和我一样，为今日情报局的男女成员感到自豪。

我感谢基斯·杰弗里教授接受了撰写我们的历史的任务，感谢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给予他假期来完成这一任务。这是一部迷人的作品。谨此向您推荐。

约翰·索沃斯
秘密情报局局长

秘密情报局不泄露特工或现有工作人员的姓名，只同意在例外情况下公布已故成员使用过的匿名。认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有充分理由将一些原本应予保护的资料公之于众，这本属例外，亦符合情报局编纂出版其历史的目的。

但是，秘密情报局的条令并不限制偶尔正式披露一些情报局资料——为撰写另一些重要情报工作者的传记作品，我们曾经授权对情报局资料做有限披露。

为确保本历史著作不损害国家安全，已经删除了大量与协作部门和机构有关的资料，这与政府“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而且不损害公众利益的政策是一致的。因此，除了在官方文件、阵亡名单或已批准出版物中披露的人员姓名外，作者不按姓名来指称任何以前未披露姓名的特工。作者也提到了少量自己暴露了身份的特工。只有在判定出于历史重要性和满足情报局让公众了解其起源和作用的情况下，作者才会提到前情报局成员的姓名。

序 言

英国秘密情报局——通称军情六处——是世界上现存历史最为悠久的旨在收集外国情报的机构。1909年10月，它作为新的特别情报局的“外国处”而成立。前四十年中，它从微薄的起点开始，发展为冷战初期一个受到重视、建立在现代化和专业化基础上并得到认可的英国政府的固定分支机构。尽管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秘密情报局主导了英国无线电情报行动（最典型的当数二战中在布莱奇利庄园对德国“恩尼格玛”的胜利），但它主要还是一个人工情报机构¹。虽然这一历史著作追溯秘密情报局的组织发展及其与政府间的关系——对从各方面了解它的行动方式和原因至关重要，但其历史基本上是人的故事，是从功勋卓著颇具个性的首任局长曼斯菲尔德·卡明和他的两位继任者休·辛克莱和斯图尔特·孟西斯，到其组织成员——在全球为其服务的男女成员——直至书末最重要的特工的历史。要对这个人员混杂的国际性组织进行兼收并蓄的概括是很难的。他们包括贵族、工人、社会名媛、官僚分子、爱国者和卖国者。他们中有些人很有勇气，其中许多人（特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他们所从事的重要而又危险的情报工作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秘密情报局并非完全产生于情报真空。英国政府采取临时的特定措施秘密搜集情报已经好几个世纪了。在17世纪，连续几任英国国务大臣在国家受到特别威胁时建立起了谍报网。外交部自1782年成立以来，利用每年由议会批准后来被称作“秘密情报表决”或“秘密表决”所获得的资金，采用各种秘密手段获取情报并警告英国的敌人²。到19世纪末，陆军和海军也有了情报搜集分支机构，这些机构拥有大量派驻国外的陆、海军使馆武官获得的相对公开的情

1 无线电情报的内容在欣斯利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情报》中有大量描写，我一般尽量避免重复这部著作及迈克尔·古德曼即将出版的《联合情报委员会正史》的相同内容。

2 参见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历史科“我的深闺夫人”上的提纲式说明。

报¹。但是，到20世纪初以后，随着国外竞争对手（特别是德国）对国家利益日益严重的挑战，英国政策制定者的目光开始超越这些既无体系又不协调的方法。因为外交部担心其外交和领事官员在情报搜集过程中被人捕获（这势必令人尴尬），建立一个专门的、隐蔽的、最重要的是可以否认其存在的机构的想法，便受到了青睐。

特别情报局以及后来的秘密情报局，历经八十多年仍得不到英国政府的公开承认。1994年的《情报局法例》才赋予它正式的法律依据。编撰一部可以让公众了解的历史——何况由一位独立的专业历史学者来撰写——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个惊人的发展，会让人记住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英国秘密遗产和公众对有关情报事件保持的沉默。受命撰写这一历史也是一个异乎寻常、生平难得的机会（和特权），尽管我也清楚地知道，在某些人看来，我被认为适合承担这项工作这一事实，也许正好证明我不适合撰写一部独立讲述秘密情报局历史著作的作者。关于这一点，读者自会评判。

就我的使命所达成的一部分协议是：我可以无限制地查阅秘密情报局前四十年的档案。我绝对相信这是实情，而且是揭秘这一档案无与伦比的待遇，这是一个十分丰富的史料宝藏（虽然有些地方不完整）。除此之外，我也获准查阅1949年以后记载情报局历史的一些资料。一般来说，秘密情报局对待档案的态度是，只要它们能服务于某一明确的行动目的，就应该保留。由于没人预见到会有人来写一部某种类型的专门历史，更不用说是一部可能出版的历史，当然也就没有出于历史原因而保留资料的必要。当情报局真正开始做历史性思考时，就我所见到的证据来看是60年代前不久的事情，大量资料已经丢失了。

在秘密情报局内部，一旦文件的及时性和作用超过时效就予以销毁，这已经是常规做法。有大量内部证据说明这一点，其中一些证据偶尔会流入公众领域。1935年，在一封给秘密情报局反间谍五处处长瓦伦丁·维维安的信中，军情五处的奥斯瓦尔德·“贾斯珀”·哈克写道：“你一份关于一位斯塔太太的旧报告刚刚曝光——我寄上一份副本，因为我相信你1920年的报告已经销毁了。”²一位官员在回顾秘密情报局20世纪20年代的工作时说，情报局总部“每年从海外分支机构收到一万三千多份各类报告，这还不包括与这些报告和行政事务有关的来往信件”，他提到“所涉及的文件质量立即变得显而易见”。为使大量资料处于控制之下，他接着说“尽一切努力销毁所有物件……不需要参考”。清除旧文件的做法很大程度上也是由该组织在上个世纪搬了六

1 对于有用的武官工作考察，参见塞里格曼所著《穿制服的间谍》和塞里格曼编著的《来自德国的海军情报》。

2 1935年3月14日哈克致维维安（英国国家档案，安全局 2/1588）。我很感谢菲尔·托马塞利提供此参考。

次家这一事实所引发的。

多年以来，一些文件被认为具有真正的历史价值而得以保存。“贝瑟尔信函”就是这样一份，它是1909年8月10日海军情报局局长致曼斯菲尔德·卡明，邀请后者出任（后经证实为）秘密情报局首任局长的信件¹。不过，那些被断断续续、有条不紊和实质性销毁的记录，有一些有历史价值，另一些则可能没有。但目前尚无证据表明，如此销毁档案是作为掩盖秘密情报局过去尴尬事件的一种手段而随意或者蓄意进行的。销毁文件更多地源于一种文化态度。这种态度认为，文件保留与否，一般是根据它们对情报局的现有价值（当然不是历史价值），最主要的是依据可操作性而评估决定的。

不受限制地查阅档案，定然经历了一个极其艰苦而又挑剔的披露程序。一开始就（由于明显的原因）规定，不能在书中首次泄露任何特工的身份。这一规定所产生的一个令人遗憾的结果（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就是必须省略掉秘密情报局的一些重大故事，因为要将它们写入书中，就不可能不涉及至少有可能间接披露特工身份的情景细节。然而，作为特例，有些特工的姓名的确在书中出现了，但每一个案例都经历了最仔细、最严格的信息披露准则的检查。凡是特工清楚地自曝姓名的地方（这对那些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工作的个人很平常），本书都相对地直言不讳。但仅仅说明某一特工的姓名已属“公开范围”则远远不够，因为“公开范围”构成极其广泛，从轰动一时的短命出版物（或可称之为“二流情报文献”）中的单薄论断，到历史学专家撰写的严肃的学术文章，不一而足。

这些严格的标准也适用于称呼那些在国内外服务的秘密情报局官员。秘密情报局已经认可我在书中使用业已在官方历史文献中披露的姓名、或者因与其他政府部门自然联络而其证件被移交到国家档案馆的秘密情报局官员的姓名。但出于国家安全的原因（这在有些情况下超越了历史学术的必要性），我不能提及其他情报局官员的姓名，包括此前已在可靠的学术著作中披露了身份的一些官员。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使这部历史著作失去个性，并且遏制了我对情报局功勋人士予以褒扬的愿望，但对我复述前四十年中塑造了情报局的官员和特工的诸多伟绩，并未造成实质性的削弱。

虽然空间不足致使大量文档被销毁，特别在20世纪60年代情报局总部从“百老汇”到“世纪大楼”的搬迁期间，事实上仍有大量档案保存下来。但首先要说的是，档案中含有的实际情报极少（这也许令人惊讶）。在我所关注的

¹ 1909年8月10日海军上将亚历山大·贝瑟尔致卡明，图像见秘密情报局网站：<http://www.mi6.gov.uk/output/the-bethell-letter.html>（2010年1月20日访问）。

1909年到1949年这一时期，秘密情报局已经主要是一个满足来自客户部门——主要是其领导部门外交部和诸军各部——对情报资料的一般需求或特殊需求的情报搜集机构。所需资料（如能获得）被收集起来转交给相关部门。在此过程中，除非对情报的可靠性有提纲领性要求，情报局内部很少或根本不对情报做任何分析。一旦原始材料转交给了用户部门，他们就着手处理而且通常是销毁原始文件。情报评估是外交部、陆军情报局等部门负责人的具体事情，不是秘密情报局的工作。

因此，秘密情报局的部署和工作主要是由优先考虑国外情报机构来决定的。以苏联共产主义作为主要目标的战争和对地中海及远东海军事务的特别关注，清楚地表明了海军部的观念和情报需求。在20世纪30年代早中期，由于受到资金短缺的严重限制，秘密情报局的情报并没有集中在原本应该注意的纳粹德国日益严重的挑战方面（当然这也是过后方知）。不过，虽然情报局没有很快报告德国的重新武装，伦敦方面对德国国内政局发展的秘密情报显然也没有任何需求。例如，秘密情报局档案中（不管在这一时期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没有任何关于迫害犹太人和“终极解决方案”的资料。1939年1月，一份来自瑞士的报告是一个罕见的例外。一位秘密情报局的代表曾问一个奥地利犹太难民是否可以提供“有关集中营里的人的情报”。资料上说他认识一位日内瓦的男子，该男子在达豪集中营度过了九个月，“但他不知道能否让这名男子来谈一谈。他说德国难民不敢说任何反对德国的话，因为欧洲国家到处是纳粹特务，他们害怕遭到报复”。

我在这部历史中曾想做这样一件事：寻找可以追溯一份具体情报从获得到实际利用的过程的例子。由于原始资料严重不足，我发现这很难做到（虽然在某些案例中并非不可能）。我可以这样说，在有关无线电情报方面的情形又大不相同，因为无线电情报的大量原始材料保存下来了，并可以随时利用，比如在哈里·欣斯利爵士“估量它对战略和行动的影响”的权威著作中就可以，正如其副标题所承诺的¹。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就能追踪来自被占领国比利时“白衣夫人”小组的人工情报的利用，以及在德国的海军间谍“TR/16”对要求了解1916年日德兰海战中德军损失所作的现成情报答复。20世纪30年代中期，情报局报告被用于通知英国对德国重新武装的评估（尽管未受到应有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秘密情报局的具体报告为1942年2月对布吕讷瓦勒的重要袭击提供了依据，并且报告了德国V型武器发展计划的早期迹象。

¹ 参见欣斯利，《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情报机构》。

但是，总体而言，人工情报的故事一般都不是绝顶聪明的大间谍或像玛塔·哈里¹那样色诱男人的女间谍（尽管眼尖的读者可能在本书中找到一两个这样的例子）和荒诞离奇、赢得战争的谍报行动的故事。它更像一幅点描画，包含着成千上万男女在充满危险的环境中搜集来的情报碎片，需要集中起来才能构成一幅大画面。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挪威海岸沿线的观察者提供了敌人军舰行动的珍贵情报。这些个人不可避免地要暴露在公开场合；一旦抵达现场，他们不仅要搜集自己看不见的情报，还要迅速将其传回伦敦；在此过程的每一阶段，被发现而受到的惩罚几乎肯定是难逃一死。两次世界大战中，在欧洲敌占区的普通男女都冒着同样的危险。比如，观察火车，仔细记录火车及其所运货物的运动路线和努力查明它们所代表的部队番号。我们不应为为数众多且大多是无名人士令人惊奇的勇敢行为保持沉默。他们中很少有电影或小说中受人喜爱的那种间谍，但许多人对20世纪上半叶英国情报工作的成就做出了贡献。

秘密情报局档案中现存材料对于情报获取的过程和管理的记载，远比情报本身丰富得多。这类资料都注明了情报工作各个方面最为敏感的情报“来源和方法”：官员和特工的姓名，情报来源，帮助者，组织，商业伙伴，行动技巧，各种专业技术技能等等。虽然其中一些档案不再构成任何安全风险——比如披露40年代的无线电技术似乎不再有危及国家安全的任何危险——但涉及特工及其活动的文件仍有可能危及他们和他们的家庭，即使他们已经很长时间不再为秘密情报局工作。例如，一份典型的特工档案虽未涉及过多细节，却可能提到她（或他）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大量文件可能包含有此后许多年该特工住址的详细情况（比如住在某个外国城市），养老金的支付，也许还有某位情报局官员在圣诞节带了一瓶威士忌或别的适当礼物前去探访的报告。情报局认为绝不可以泄露的，正是这一类资料。

虽然这一史书仿佛是从总部的角度撰写的，却反映了本书赖以为基础的秘密情报局现存档案制度。这意味着，要再现处于人工情报工作核心的主管官员和特工之间的个人关系，有时很难做到。忙碌的主管官员们并不经常有时间去写有关他们手下特工的个人特点和动机的回忆日记，尽管这些精彩事件的某些线索能够幸运地保存下来并写入拙著中。一般来说，我对传记材料的使用很谨慎。虽然传记作品经常从个人方面揭示对某些事件和情感的回忆，但在历史学

1 玛塔·哈里（1876年8月7日—1917年10月15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著名德国美女间谍，祖籍荷兰，原名玛格丽莎·赫特雷达·泽莱，巴黎知名交际花，与欧洲多国军政要人、社会名流都有来往，最终在巴黎以德国间谍罪名被法军枪毙。其名字在西方间谍小说中已成为以美色引诱男人以获取情报的代名词。——译注

家看来，有时多年以后却会在解释和评价上产生严重的问题，特别在涉及谍报活动和另一些秘密活动的时候，常会给这些活动披上一层秘密、阴谋、推测和杜撰的戏剧性色彩的外衣。这并不是说，此类事情就不存在——所有诸如此类的例子都能在本书中找到——我在一些似乎很有启发性的案例中也利用了一些二手资料。但是，我的主要目的是将本书建立在尽可能接近现存同时代文件记录的基础之上。如果这种方法要冒丧失生动逼真的风险，那么出于历史准确性的原因，就让它如此表述吧。

如同参考注释所表明的，我还享有查阅英国其他政府部门相关未解密文件的特权。这些文件对帮助确定秘密情报局在更为广泛的官僚体制下的地位特别有用。除一小部分例外，所有其他主要的一手资料（包括国外档案中一些特别有价值的资料）都完全对公众开放。

来自保密或公开档案的文件引文均按原文精确引用，但下列情况除外：大多数官方报纸上大写的专有名词用于案件名称，引号中涉及的特工和行动代号；电报或其他文件中个别段落的序号或文体不引用；人名、地名和组织名称用字母代码（“A”、“B”、“C”等）表示的信件，分散发送的关键情报，用代号字母替代的正确名称。已破译电文中的问题文字和原文一样引用（例如“？可靠”）。若干情况下，为使内容清楚，已对标点符号做了默默改动。由于秘密情报局档案没有对公众解密，所以不对这些档案提供任何来源注释。此种情况下，我遵循英国以往官方历史的先例。对历史货币当前价值的计算以零售价指数为基础，如同www.measuringworth.com所示，该公司也用于获取兑换率信息。

本书对秘密情报局历史的讲述终止于1949年，那正是情报局从一个很小的、一个人的组织向公认的现代化专业机构转变的时期。在存在四十年之后，秘密情报局开始了又一个四十年的历史，在此期间，苏联共产主义的冷战挑战将占据主导地位。但这是留给我继任者的事情——如果此段历史将被续写的话。

致 谢

尽管本书扉页只能出现一个人的名字，但没有哪一部历史学术著作会是一个人独自努力的结果，虽然作者个人可能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我们，尤其是我个人，应该感谢那些教育并激励我们的人（在这些人中我特别要提到哈里·欣斯利爵士）；感谢那些我们依靠其心血成果的学者同仁；感谢那些帮助保存我们所利用的珍贵历史资料的档案管理员与图书管理员；感谢在有时面对可能令人心力交瘁的学术困扰时，朋友和家人给予的支持与宽容。

我首先要感谢克里斯托弗·巴克斯特，他致力于此课题的博士后研究已长达四年。在此期间，他一直以他卓越的能力，在勤奋工作、严谨治学、睿智的建议和面对责难时的极大耐性方面给我以支持。内阁办公室的萨利·福尔克、马克·西曼、特萨·斯特林自始至终提供了可喜的支持。此外，我还从吉尔·班尼特和邓肯·斯图尔特（分别是联邦外交部前首席历史学家和英国特别行动处顾问）的慷慨帮助和建议中获益匪浅。对具体历史事件提供了有价值的研究帮助和建议的人员分别有：理查德·奥尔德里奇、斯泰西·巴克爾（来自渥太华）、吉姆·比奇、安东尼·贝斯特、安德鲁·库克、约翰·费里斯、M. R. D. 福特、已故的彼得·弗里曼、埃尔斯佩思·希利（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雅罗斯拉夫·赫尔贝克（来自布拉格）、彼得·杰克逊、莎拉·金克尔（来自耶鲁大学）、伊瓦尔·克拉格伦（来自奥斯陆）、塞巴斯蒂安·劳伦（来自万塞纳）、拉里·麦克唐纳（来自帕克大学）、克雷格·麦凯、朱迪斯·米尔本、约翰·巴特尔、亚历山大·米勒、伊曼纽尔·彭尼科特（来自万塞纳）、基斯·罗宾斯、阿伦·夏普、伊戈尔·舍菲、理查德·斯托尼（来自土地注册处）、马丁·托马斯、菲尔·托马塞利和已故的托马斯·特罗伊。外交和联邦事务部的帕特里克·萨尔曼和他的同事提供了持续帮助，安全局成

员、政府通信总部的历史学家、情报部队博物馆工作人员和马尔科姆·卢埃林—琼斯（海军部历史科）也提供了帮助。已故的男爵夫人帕克对40年代情报局的回忆使我受益匪浅，我至今珍惜同已故的托尼和莱纳·布鲁克斯就战时和战后事务进行的谈话。在撰写本历史著作期间，我在秘密情报局内获得人们对此课题的极大热情，以及情报局各方人士提供的无价的帮助。出于必要，他们仍必须隐姓埋名，不过我可以提及约翰·斯卡利特爵士的名字，他的灵感和推动奠定了本项目开始的基础。他对本研究和著述极感兴趣，主动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建议和批评，而且总是向我保证，本书叙事的平衡和书中最后的论断皆由我自行掌控。

文学代理商A. M. 希斯公司的比尔·汉密尔顿，是一个令人欣喜、实力超群的可信赖者，他的美国同事迈克尔·卡莱尔也一样。布卢姆斯伯里的迈克尔·菲什威克和美国企鹅出版公司的埃蒙·多兰共同修订了最后版本。一个杰出的专业团队包括安娜·辛普森、彼得·詹姆斯、凯瑟琳·贝斯特和克里斯托弗·菲普斯帮助我安然通过了出版制作过程。

我在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历史及人类学学院的同事和学生，对我在贝尔法斯特屡屡缺课表现出令人满意的通融。学院院长戴维·海顿从一开始就慷慨支持。我的同事，特别是讲授文科硕士课程的同事（具体是保罗·科索恩、彼得·格雷、安德鲁·霍姆斯、肖恩·奥·康奈尔和艾玛·里丝）毫无怨言地接下了本应由我承担的重任。这一路上，我还得到许多其他朋友的帮助，包括克里斯托弗·安德鲁、塔姆辛和盖伊·毕奇、罗伯特·布莱斯、格丽泽尔达·布鲁克、科林·科恩、约翰·丹西、约翰·福克斯、纳瑟莉·吉尼特—露菲雅克、约翰·古奇、彼得·亨尼西、尼古拉斯·希利、彼得·马特兰、阿伦·梅加赫、尤南·奥·哈平、戴维·罗巴吉、韦斯利·沃克、艾娃和查尔斯·伍尔科姆。在项目后期，我得到国家健康服务中心许多人的精湛护理，特别是沙默斯博士、哈里·刘易斯先生和基兰·麦克马纳斯先生。我最亲密的朋友和家人，尤其是萨利、本和亚历克斯应该知道，我多么感激他们的关爱、支持和理解，特别是在项目最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对于在研究和撰写本历史著作的过程中我得到的所有帮助，我无以回报，在此再次衷心地表示感谢。

K. J., 2010年5月

目录

Contents

前言/VII

序言/IX

致谢/XV

第一部分 早期岁月/001

第一章 情报局的起源/002

第二部分 第一次世界大战/027

第二章 发展状况、组织架构和专业特长/028

第三章 在西方的情报行动/050

第四章 行动范围扩大/072

第三部分 两次大战之间的岁月/103

第五章 秘密情报局的诞生/104

第六章 从德国兵到布尔什维克/127

第七章 国内事务/158

第八章 小本经营/188

第九章 战争迫近/217

第四部分 战争影响/251

- 第十章 战争初期任务繁重/252
- 第十一章 欧洲舞台的系列活动/286
- 第十二章 从布达佩斯到巴格达/319
- 第十三章 西方和东方/340

第五部分 赢得战争/367

- 第十四章 局势发生改变/368
- 第十五章 从瑞士到诺曼底/395
- 第十六章 欧洲战场的胜利/425
- 第十七章 亚洲和大战结束/449
- 第十八章 重新制订战后情报计划/466

第六部分 热战到冷战/481

- 第十九章 和平时期的工作调整/482
- 第二十章 欧洲的部署和行动/504
- 第二十一章 遍及全球的情报触角/534

第七部分 结尾/559

- 第二十二章 秘密情报局：前四十年的领导作用和表现/560

参考文献/583

第一部分

早期岁月

第一章

情报局的起源

秘密情报局是在一种令人好奇的低调方式中产生的。1909年10月7日，海军中校曼斯菲尔德·卡明，情报局首任局长，一整天都在工作。他在日记中写道：“去办公室，在那里呆了一整天，没见到一个人，也没有什么事可做。”¹ 实际上，卡明无所事事了大约一个月才和与他一道被任命管理一个“特别情报局”的弗农·凯尔上尉理清新机构的职责。一开始的迟缓源于对新机构的好奇。它的跨部门性质也很延误事情，受到了资助部门——外交部、海军部和陆军部——因关联作用而造成的一些微妙的传统风格影响，这是秘密情报局前四十年中不时产生的一个问题。新成立的特情局极其隐秘——另一个持久的特点——使得卡明很难取得自己所希望的快速进展。不过，到1909年底，他已经成功地建立起一个致力于秘密收集外国情报的组织的雏形。这一组织在形式和作用上都被公认为“秘密情报局”的前身，而它终将以此名称广为人知。

外国威胁、间谍狂潮和特别情报局

特别情报局建立于国际竞争不断加剧之时，当时英国的战略政策制定者正特别关注极富侵略性而又野心勃勃的德意志帝国的挑战。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英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历史上最庞大的帝国。英国的领导者们能够追逐所谓的“光荣孤立”政策²，主要是没有受到任何来自其他国家的严重威胁。但到19世纪末，英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主导地位开始受到威胁，而且随着竞争国家的追赶，英国的势力范围——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称之为帝国的“过度扩张”——开始被认为是一个潜在的软肋。1906年，一位外交部官员将英国描述为好像“一个得了痛风症的巨人”，手指和脚趾伸向全世界，想要收拢就“不能不发出尖叫”。在重新对20世纪头十年做了一系列战

1 秘密情报局早期历史最重要的资料就是曼斯菲尔德·卡明的日记，是他被任命到特情局之后作为专门的办公室工作记录而写的。日记涵盖的最早时期从1909年8月到1914年1月（但有大量缺省，尤其是1911年到1913年），仅存于显然由卡明本人键入的打字复印影印本中。

2 光荣孤立政策：19世纪中叶起英国执行的外交策略。核心内容是：英国不应参加任何固定的同盟和集团，保持行动自由，便于操纵“欧洲均势”。20世纪初，由于英国自身力量减弱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崛起及其相互之间的矛盾加剧，逐步放弃此政策。——译注